

## 中文版序言

很多人都觉得亚洲社会很神秘，其实不尽然。一千年以前，大多数亚洲社会，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欧洲；今天，所有的亚洲社会（日本除外）却大大落后于欧洲。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亚洲社会丧失了一千年的时间？亚洲社会为何忍受欧洲对其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剥削？为什么中国这么一个具有享誉世界文明的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却任由一些欧洲小国瓜分其领土（如葡萄牙占领澳门、英国占领香港）？

1998年当我出版此书时，这些疑问就一直纠缠着我。虽然我给这本书取了一个煽动性的名字“亚洲人会思考吗”，但我无意于侮辱我的亚洲同胞。相反，我只是想提醒我的亚洲同胞去关注这些疑问。我很担心的是如果我的亚洲同胞不敢正视这些问题，亚洲社会会更加落后，甚至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赶上西方社会。同时，我试图去警告西方社会，他们不应该低估亚洲人的思考能力。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本书的内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中文版《亚洲人会思考吗？》是第二版。本书已在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西班牙和印度出版。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北美洲，《亚洲人会思考吗？》都有很多读者，这让我很感动。

我衷心地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能够发现本书的教育意义和发人深省的启示。

本书的观点并不试图去回答上述疑问，但我相信尽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很难找到，但是尝试着去回答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期望得到中国读者的反馈意见。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2004 年 10 月

## 第二版序言

200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让我感到兴奋异常。在这篇报道中,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东亚人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存在差异。在该研究中,奈斯比特博士观察到:“亚洲人较注重‘整体’,对环境显示出较强烈的关注,较为容忍分歧,较少依靠逻辑;而西方人则更为重视‘分析’,化解矛盾,专注于那些脱离其背景的目标,以及更为依赖逻辑。”

我还没有看到奈斯比特博士的最终研究结果,现在的研究似乎只是初期成果,它不能因此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些发现的确证实了我一直持有的源自我人生经历的一个直觉,那就是:在某些问题上,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确不同。在文化方面,精确的事实是不可更改的,但思维规律却可以改变。因此,某些价值观也是可以变化的。

回顾我半个世纪的人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体验

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孩童时，我是移民到新加坡的一个印度家庭的成员之一。我的邻居都是马来穆斯林。新加坡的国内社会由华人占主导地位。我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附属地，并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两年后的 1965 年，有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我接受的基本上是英语教育。此后，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同时在东方和西方游历。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孕育了我在本书中阐释的思想。

本书所选择的题目“亚洲人会思考吗”决不是偶然的。从本质上看，这个题目提出了两个可以糅合在一起的问题。首先是向我们亚洲同胞提出的问题：“你们会思考吗？为什么亚洲社会丧失了一千年的时间，远远落后于欧洲社会 在上个千年开始时，它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无疑是一个刺耳的问题。第二版的头两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我的西方友人的，那就是：“亚洲人会为自己而思考吗？”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上。反映了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观念传播依然是单向的：即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西方人并未认识到，他们向整个世界妄称自己是道德的“高地”(high ground)。但是，其他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坚信：与已经僵化的亚洲观念和文化相比，他们的观念与文化是开放的，并具备自我批判的特性，因此不存在任何“圣牛”(sacred cows——

“圣牛”比喻不可妄加评判的人、事物或思想——译者注）在我的生活中，令我最为震动的发现是认识到所谓“圣牛”同样存在于西方人的观念中。

即便本书的某些内容（尤其是统计数据）可能有些过时，但我相信提出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通过在西方出版物上对这些当代问题的传播，本书为自我欣慰的甜蜜感觉提供了注脚。好几个美国教授告诉我，本书的一些文章充斥着空谈，并对主流观念产生了冲击。

直觉告诉我，东西方间的观念交流从本世纪开始就是双向的。当西方不再主张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普世文明时，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繁荣和丰富多彩。将这个西方观念从其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惟一方式是，思考西方观念同样存在自身局限性的可能性。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本书所包含的任何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新加坡政府的官方看法。

## 第一版序言

亚洲人会思考吗？从过去若干世纪亚洲社会的历史判断，答案应该是“不会”——或者说，最多是“不是很好”。葡萄牙人冲出其狭小的疆界若干世纪之后，从巴西到安哥拉、从莫桑比克到果阿、从马六甲到澳门，整个世界遍地都是它的殖民地。亚洲社会依然停留在昏睡或停滞的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直到15世纪前后，曾经多多少少与亚洲文明等量齐观的欧洲文明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领先地位。不能认为花几个世纪时间苏醒的社会是擅长思考的社会。对于亚洲人来说，否认这个痛苦的历史事实是愚蠢的。

到20世纪结束之际（即葡萄牙人开始对外扩张的500年之后）几个东亚国家社会已经开始紧随日本之后成为与西方国家一样发达的社会。此后，它们重复了亚洲历史上的痛苦经历，再度步履蹒跚。1998年初期（正值撰写本序言的时候），扬言亚洲困境如何严峻未免言之过早。但是，奋力追逐西方已经经常遭受挫折，因此，亚洲人有

责任思索，并且应该深入地思索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和新千年，自己的前景如何。本书的一个关键目的就是激发亚洲观念，提出有关其未来的若干问题。主要文章的撰写是为亚洲观念而准备的。它们传递给亚洲人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不要认为你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反思历史，几个亚洲社会所享有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轻易地成为了过去。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重组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到来。

本书一些章节针对的是范围更大的受众。冷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首都弥漫着必胜信念的情绪：似乎共产主义已经崩溃，西方已经大获全胜，人类已经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自此，全球任何角落的任何国家，无论其社会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将成为西方发明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复制品。民主从西方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视为一种好事。但是，就像罗伯特·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1997年2月）中所说的，这种全球传播民主的结果并不理想：

虽然那是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对外政策主要追求的目标，即便在那些冷战很少触及的地方，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苏联的崩溃而向卢旺达以及其他国家施加构建政党的压力。1989年东欧国家的解放，对于民主和先进的工业国而言，具

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和社会前提：无产阶级状态、西方启蒙运动、高教育率、低出生率等等。冷战后，努力将民主带到这些国家是合理的。但是，事实上缺乏合理性的是将枪指向发展中世界人民的脑袋上宣称：“就像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已经经历的西方启蒙运动那样去做吧。就像贵国95%的人民已经自由了那样去干吧。就像你们没有任何流血的种族或地区争端那样去干吧。”

到1997年后期（冷战结束之后8年）源自取胜苏联的狂妄自大情绪已经逐渐消失，一些大胆灵感应运而生，比如说罗伯特·卡普兰和法立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sup>①</sup>，在质疑冷战后急切输出民主的价值与后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时候，本书中的一部分已经完成，对西方知识界提出的关于民主输出的基本问题没有涉及。

我完全可以自信地论述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在那段时期里，我与西方知识阶层有过几次正面接触，从威廉堡到布鲁塞尔，从哈佛到迪奇里（**Ditchley**）我们彼此间都有过交锋。在这些遭遇中，我是惟一持有不同声音的人。在西方人胜利的时刻向西方民主自由智慧提出挑战，总使我处于困难的境地。我的经历并不独特，我的几个亚洲朋友也具有类似的经历。这里的悖论是，西方的自由传统

声称它欢迎不同的声音。但是，我的个人经历显示并非如此。

这些遭遇使我确信，必须清晰地提出选择性观点。对于冷战结束后西方的狂妄自大，我的反应是1992年夏发表于《国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方与其他世界”（在此我要声明我获得了该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的帮助，他建议采用这个诡诈的题目）。

紧随这篇文章之后，1994年春我在《华盛顿季刊》发表了“年轻人到东方去！”一文。这篇文章获得了“西方与其他世界”一样的知名度。“年轻人到东方去！”是由我的文章“政治发展观察与民主过程的本质：人权与新闻自由”改编而来的。我在1993年1月的一次关于“亚洲和美国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亚洲社会会议上发表了这篇文章<sup>②</sup>。或许该文章包含了我对自由传统最尖锐的批判。因此，我决定再次重新发表完整的版本。

“年轻人到东方去！”之后，作为对萨缪尔·亨廷顿的知名文章“文明间的冲突”的反应，我相继发表了“波尔布特：道德正确性的悖论”、“衰落的危险：其他世界可以教西方什么？”等文章。亨廷顿决定于1993年夏季发表这篇文章，对我而言真是幸运。我对他的回应几乎从其文章初稿时就全程跟踪了。在出版界，这有益于引起读者的关注。

在20世纪初期，我所发表的这些论文与其他亚洲人

以同样的心情发表的文章，有助于在知识阶层开创一个细小的新篇章。这一章“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因为广受欢迎的观点而声名远播。

从本质上看，亚洲价值观这个术语显示了对西方观念的基本误解，即亚洲的声音在20世纪初已经被西方接受。西方的许多人认为，在社会和政治理论方面向当代西方观念提出挑战的那帮人正在鼓吹亚洲价值观的优越性。实际上，大多数亚洲人所要试图表明的要点是亚洲价值观决不是劣等的。他们力图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阶层的新论争中，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表演舞台。我们拥有历史后见之明的优势，因此现在可以考虑这些年的得失，了解到亚洲不会重蹈西方“劝诱改宗”的那段时期。他们仅仅是对西方改变信仰要求的回应。

冷战结束后，西方输出价值观运动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这样的假定，即西方如此作为的良好意愿必将产生美好的结果。这就是我在关于波尔布特一文中引用马克斯·韦伯一段话的原因，韦伯指出：“善意仅仅得自善意，邪恶仅仅得自邪恶。这不真实，相反的结论通常也是真实的。任何这么说的人在政治上的确幼稚。”<sup>③</sup>价值观从一个社会或文明传播到另外一个社会，其道德上的复杂性在冷战结束后已经使西方知识界的道德信仰陷入迷茫。但是，前几代西方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道德复杂性。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阐释的：

将我们的权力扩展到遥远大陆的同样力量已经……使我们陷入一个巨大的历史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他们的意志间接或与我们形成对照的方向而运行，与我们所热诚渴求的目标不可避免地相互制约或相互抵触。即使在我们坚信我们的道路具有“人类福祉”的前景之时，我们同样不能完全拥有自己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显然已经沉寂无声了。东西两方都从争论中尴尬地抽身后退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两方都有些过分。对于亚洲方面而言，几个活力四射的东亚经济体遭受引人注目的挫折之后，对曾经自信地谈论亚洲崛起产生了懊悔的真实想法。许多密友在这样不幸的关头奉劝我不宜再版本书，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时机的选择看起来尤其不吉利。

但是，本书并非是为任何短期目的而打算的。亚洲文明达到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那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在亚洲新观念中，东亚的现实是充满自信地深信他们的时代即将来临，即便在此之前，他们必须遭受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挫折。现在，许多亚洲理念已经跻身于西方文明的最高层次，在科学技术、商业和管理、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均是如此。在这些层面上，大部分亚洲理念已经繁荣昌盛。业已苏醒的亚洲精神近期内不可能再度沉睡。当亚洲社

会再次腾飞之时，一个新的话语将在东西方之间开始出现。

这个话语出现时，他们将会回顾20世纪90年代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以此作为将持续若干世纪的话语使用的第一回合。在过去几个世纪历史的时间点上，无论是殖民统治的尖峰时刻，还是冷战终结之后的历史阶段，西方都体验了许多支配性时光。他们据此产生了一种自负感，认为人类最终都会融入到西方文明的网络之中。 V. S. 纳伊珀，一个西方的亚裔孩子，激烈地坚持这个信念，他声称西方文明是惟一的普世文明。的确，对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多数人而言，任何其他看法似乎都是难以想像的。不适当地称为亚洲价值观争论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呼唤关注这种可能性，那就是：其他文明也能像为人类发展与进步大有作为的西方文明那样做出同样的贡献。这是本书出版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确保历史事实的准确性 所有文章都是原文再版。因此 在某些基本观点上 读者可能会看到一些重复。

我出生于英国附属地的新加坡，孩童时曾经向英国国旗致敬，我幸运地经历了许多历史的变迁，清楚地了解到所有国家的潮起潮落。历史决不会停止或终结。在我们这个正在缩小的星球上，东西方关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古代文明之间将直接和谐交往，这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是无法看到的。

预测文明间密切交往的后果是愚蠢的。虽然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是那也必须严肃对待。但是，正如某些有幸经历亚太崛起年代的人那样，我绝对坚信：未来取决于文明间的融合之上。这是1994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温哥华年会上，我的演讲所要阐释的观点。该研究所的月刊《生存》出版了编辑后的演讲文本 题目是“太平洋动力”。该文被收集到本书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还发表了关于其他话题的文章。其中一些再版于本书。只要我依旧相信亚太地区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力量中心，我还将撰写几篇关于该地区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准备再版“漂泊的日本”(写于哈佛)“亚太共识”以及“关于亚太安全的七个悖论”。

我同样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个学生。东南亚已经显示出是世界上最为和平与繁荣的地区，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东南亚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甚至比欧洲的巴尔干还要显著)。如此奇迹委实令人费解。为了向日本听众解释之，我撰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东盟的魔力”，该文发表于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月刊上。

我是一个新加坡人，如果没有关于祖国的文章，那么本书将是不完整的。能够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成功的国家的公民，我一直深感荣幸。虽然新加坡成就非凡，但是它不时也有遭受有害新闻的不幸，这些新闻对国

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并未给予应有的认可。因此，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请我撰写一篇关于新加坡发展经验的短文时，我乐于从命。

最后，为了维持这些文章的激情，我决定本书以一篇煽动性的短文结尾，题目为“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十大戒律”。这“十大戒律”是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会议撰写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版均已出版和再版了。我已经认识到，只有简洁才会广受欢迎。因此，序言部分就此打住，其他的故事就让文章去说吧。

## 亚洲人会思考吗？

1997年6月，第七届国际思维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议需要来自亚洲的声音。当我应邀发言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浮现于脑海，那就是“亚洲人会与其他人一样思考吗”？我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次演讲是我回答该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主要目的是在亚洲观念中发起一场讨论。但是，来自其他大陆的人或许也希望询问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欧洲人会思考吗”或“美国人会思考吗”？这是本演讲的最新观点，它发表于1998年夏季的《国家利益》杂志上。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迄今为止，这篇文章并未在亚洲人中激起任何论争，讨论亚洲社会与文明如何以及为什么落后于欧洲文明若干世纪。这个问题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本人坚信，亚洲崛起的时间还未来到。大多数亚洲社会（日本和“四小虎”除外）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当它们达到这个水平之时，这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表面化了。

但是，西方人对这个话题的消极反应让我深感震惊。或许其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西方某些人不愿意亚洲人提出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未来的基本问题，难道这不是事实的本质吗？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那么亚洲某些社会最终将与西方社会一样成功，这完全是可以想像的。

对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而言，让他们抛弃希望亚洲社会继续落后的想法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亚洲知识界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东西方间的如此差异表明，世界上的确还存在急需弥补的深刻认识差距。

亚洲人会思考吗？这显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时代，如果到欧洲或非洲并提出“欧洲人会思考吗”或“非洲人会思考吗”这样的问题，那就想像一下由此激起的喧嚷场面吧。但如果你是亚洲人，就得质问“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

鉴于该问题的敏感性，我就解释一下提出该问题的理由及其出台的语境。首先，如果你要询问某个人可能决定全球前景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答案或许就是“亚洲人会思考吗”。1996年，亚洲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70%（在全球50亿人口中，亚洲占35亿）。据保守估计，到2050年，亚洲人口将会增加到57亿，而全球人口将达到98.7亿；与此同时，北美和欧洲的人口则相对维持不

变，其人口总量分别为**3.74**亿和**7.21**亿。这就意味着北美和欧洲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将会从**20%**下降到约**11%**左右。很明显，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以及近期的北美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承担了相对更大的责任。到**2050**年之前，当欧洲和北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五分之一降为十分之一的时候，其余**90%**的人民还要期待**10%**的欧美人民继续肩负如此重责，难道这称得上公平吗？从现实的角度看，其他世界可能继续依赖西方吗？如果亚洲人口在往后**50**年里翻番，亚洲人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其次，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单个的亚洲人不会思考。显然亚洲人能够掌握字母表，懂得二加二等于四，并能下棋。但是，纵观历史，亚洲是能够产生杰出人物的社会，但作为集体却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流离失所。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犹太人社会所面临的境遇，犹太社会贡献了更辉煌的人类思想，这与它所拥有的杰出人物数量是相称的，从爱因斯坦到维特根斯坦，从迪斯拉里（**Disraeli**）到基辛格等大量的人杰比其他任何社会都要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它们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这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尤其严重。要强调的是，我不会论及以色列在现代遭受的困苦。我要谈及的是始于公元**135**年的那段时期，当时的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类似的命运将会降临到亚洲人的头上吗？或者说亚